

卞伯泽
辑著

东川府编年史

卞伯泽
2015年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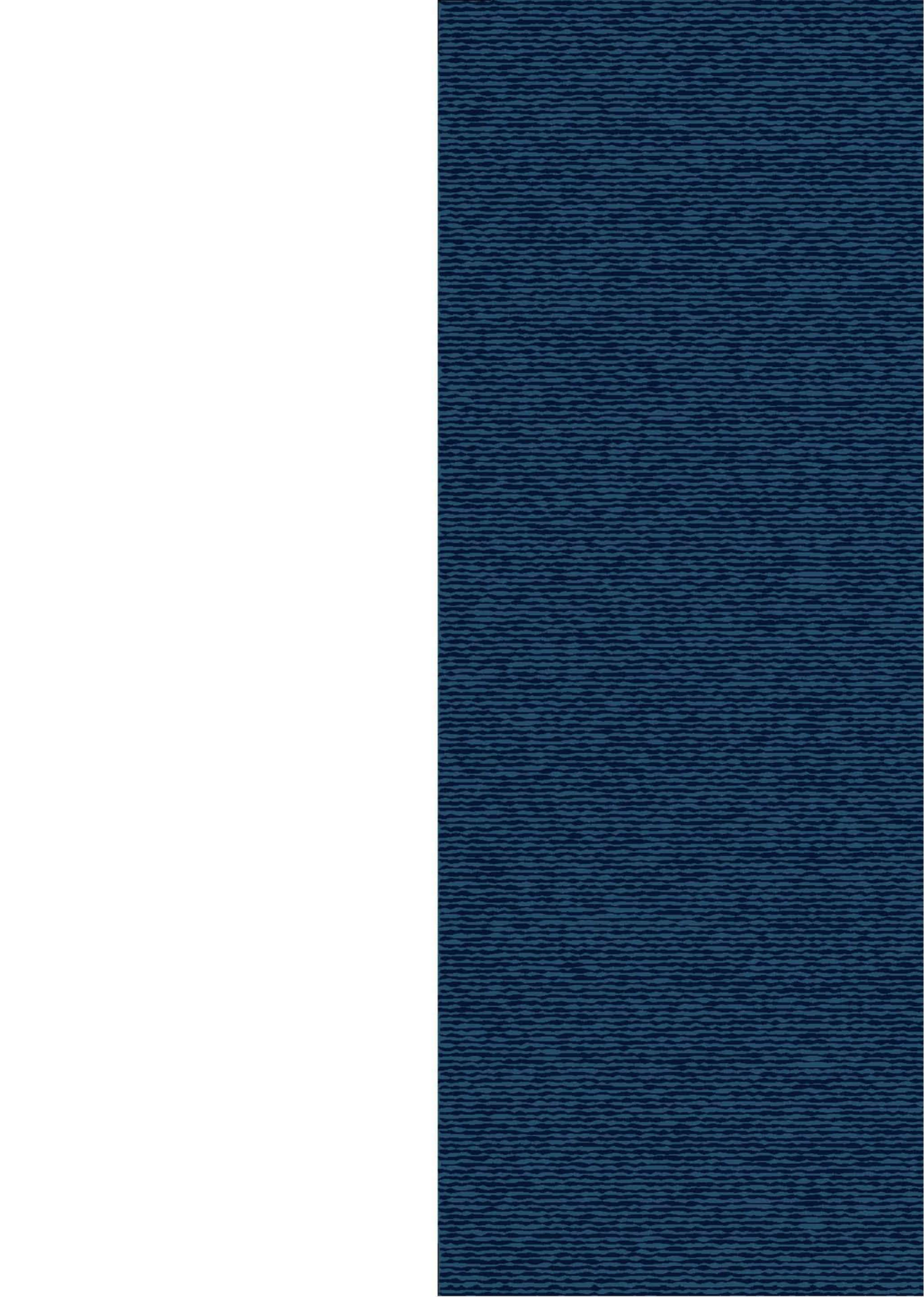
卞伯泽：祖籍四川江津，1942年9月生于会泽，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云南省会泽县钟屏中学校长，政协文史委主任，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会泽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会长，春蚕诗社副社长等职务。现为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特邀学者、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荣誉研究员。

自1984年始，一直从事地方史志的研究，曾接受过中央电视台一、二、三、四、七、十二频道及台湾中视，香港凤凰卫视以及福音时报的专访。曾为云南农业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北京美术学院等单位做过有关会泽历史文化的讲座三十多次，担任过《唐继尧研究集》副主编，主编过《会泽文史资料》二至十辑、《名城研究》一至五辑，所编《会泽历史》一书，曾作为会泽中小学乡土教材。

迄今为止，已正式出版了《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会泽之旅》、《会泽文化之旅·民俗篇》、《会泽文化之旅·民族篇》、《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会泽雨碌·天下第一地缝之乡》（与郭兴良教授合作）、《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上、下）、《古城遗韵》、《趣话方言》、《舌尖上的会泽》等著作。

自2006年提出创建堂琅文化学术体系以来，一直在探索会泽文化的特点，现已归纳为：绵亘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和“彝族祖源文化”，形成了会泽纵向上的两大文脉，由此派生出来的会馆文化、寺庙文化以及民居文化等十多种子文化，形成了会泽横向上的经线，这种纵横交错、经纬互织的文化特点，编织了云铺绮丽、霞叠瑰秀的会泽文化大观图。

2011年11月22日，新华网在《卞伯泽——历史文化的传承者》的报导中，称其为“精通会泽人文历史的传奇人物”“会泽通宝”。





东川府编年史

策划编辑：赵红梅

责任编辑：王冬兰

封面题字：刘国民

封面设计：郑明东



ISBN 978-7-5482-3324-4



9 787548 233244 >

定价：65.00元

卞伯泽
辑著

东川府编年史

卞伯泽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川府编年史 / 卞伯泽辑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482-3324-4

I. ①东… II. ①卞… III. ①东川府—编年史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9799号

策划编辑: 赵红梅
责任编辑: 王冬兰
封面题字: 刘国民
封面设计: 郑明东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煜煌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43千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324-4

定 价: 65.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编委会

顾问：张昌山（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谭力华（会泽县委书记）

孙荣祥（会泽县委副书记、县长）

马志宇（云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刘祖铭（会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高甫（会泽县政协主席）

潘利华（会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尹正祥（会泽县政协副主席）

郭兴良（曲靖师院教授）

辑 著：卞伯泽

摄 影：周朝祥

校 对：王德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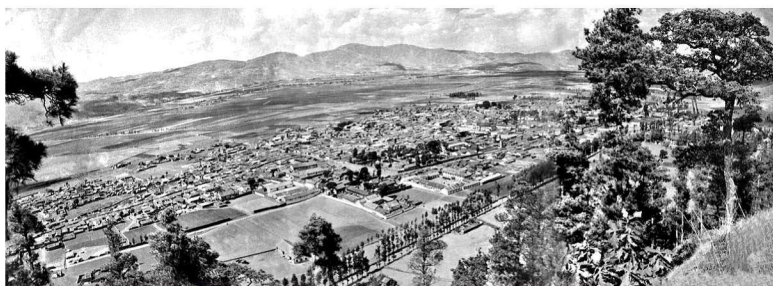
顾问：张昌山（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谭力华（会泽县县委书记）
孙荣祥（会泽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马志宇（云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刘祖铭（会泽县人大主任）
王高甫（会泽县政协主席）
潘利华（会泽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尹正祥（会泽县政协副主席）
郭兴良（曲靖师院教授）

摄影：周朝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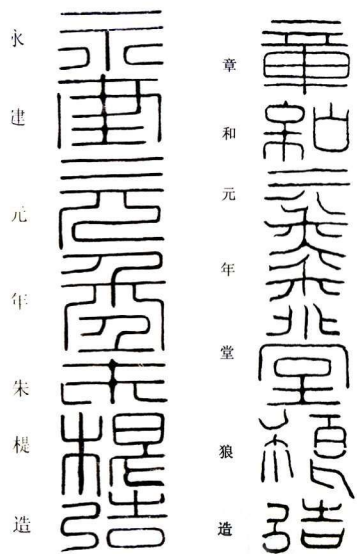
校对：王德昌



作者肖像（中央美术学院管非老师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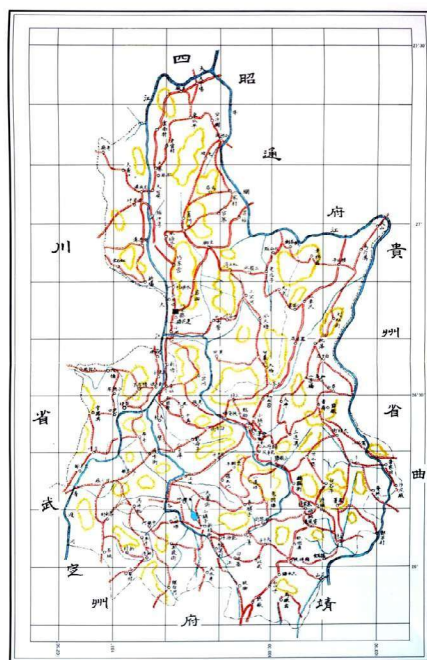
20 世纪 70 年代原东川府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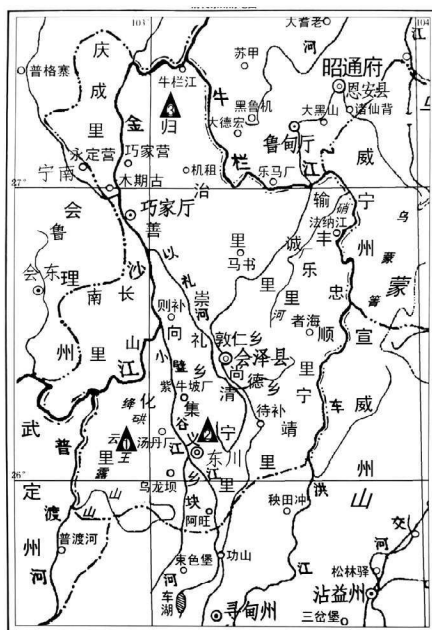
堂琅铜洗之铭文



夜郎国颁发给堂琅的印信——“统管堂琅印”



《新纂云南通志》中所绘“东川府全图”



《乾隆·东川府志》所绘“清代东川府地图”



矿务大臣唐炯像



堂琅铜洗内底之铭文及图案

序

林超民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国学研究会会长)

198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上至下开启地方志的编写修纂工作。作为会泽县地方志的主要负责人，卞伯泽先生编纂了《会泽县大事记》（编者注：未出版）。这部书首次将会泽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大事，按照年代顺序逐年纂录。这不仅是会泽县首部“大事记”，也是云南省1950年后较早编纂的县级大事记。对于会泽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起到了引领作用，对全省的地方志编纂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为会泽县地方志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牢固的基石。

经过三十多年的校改、修订、增补、充实，伯泽先生撰成《东川府编年史》一书。

《东川府编年史》以年代为序，把从商朝开始，到民国二年（1912）裁府设县为止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逐年纂录编排，以年系事，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详略得当。一卷在手，东川历史了然于胸，是学习研究东川历史必读的参考书。对于初学者是入门指南，对于领导者则是资政要览。

研究历史必须搜集丰富的资料，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寻各种人物与事件的内部联系。不完成这项工作，便不能对历史作实事求是的论述，也就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特点与

规律。

伯泽先生一个人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收集了有关东川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考古器物、民间传说，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细心辨别，专心考究，潜心分析，用心编纂，撰成《东川府编年史》。这是一部信得过、用得上的佳作。不是说，本书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挑剔，而是说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奠基之作。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伯泽先生是“云南省地方志首届主编研修班”的成员，我们有幸在研修班相识，他勤奋读书、刻苦研究、虚心求教、不断进取的精神令大家感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会泽县地方志的领导人、编纂人，伯泽先生在会泽县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和研究等方面做出的杰出成就、突出贡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他的等身著作，看不见的是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写作的辛劳。研究历史需要多年冷静的钻研，需要多年不倦的求索，需要多年专心的琢磨，需要多年反复的推敲。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当今，这是智者不为的“蠢事”。可是，伯泽先生以冷静对喧嚣，以孤寂对热闹，以求实对取巧，以认真对虚浮，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写出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为会泽的文化事业，为云南的文化事业，也为中华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看似平常却是不可或缺、不可忽视、不可低估的贡献。这本《东川府编年史》花费了他三十多年的心血写成，不能说字字珠玑，但可以说字字心血！

读了卞伯泽先生的《东川府编年史》，我不仅学到许多历史知识，更学到他无私的高尚精神。

戊戌年正月初九

三十年辑一书

(自序)

《东川府编年史》原名《会泽县大事记》，初写作于1984年，完稿于1986年，是我用了两年时间完成的第一部有关地方志的处女作，也是我在地方志研究方面收获的第一桶金。现翻阅着这部距今已有三十多年的近六万字的打印稿，斑驳的书页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人事的蹉跎。虽然人生旅途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但我还是沿着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地方志这条路走到了现在，真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三十多年来，《会泽县大事记》陪伴我度过了若干个春花秋月以及晨昏夕雨，在寒来暑往中，当撰写有关会泽地方史志的文稿时，《会泽县大事记》成了随手引证和应用的工具书，这其中也将旁搜博采发现的史料，在《会泽县大事记》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进行反复地增删取舍，补充了新的内容，删去了冗枝，经三十年的打磨，终成《东川府编年史》一书付梓，现能与读者见面，实可叹也，真正是十年磨一剑，三十年辑一书矣！它似乎在向人们说明，一张合格的成绩通知单，是需岁月的浸润、时间的磨砺的。

20世纪80年代初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掀起了一个全国纂修地方志及部门志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纂修地方志书的有关机构。处于云南边陲的会泽县，不但成立了以县长亲自挂帅的领导小组及专门从事此项工作的“会泽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把此项工作列为第九

届政府任期内的五件大事之一，各单位各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修志小组，和全国一样，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开始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为了适应各县各部门修志的需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云南大学历史系举办“云南省地方志首届主编研修班”的培训，我受会泽县人民政府的派遣，有幸参加了首届培训班的学习。半年时间里，我聆听了云南地方史泰斗方国瑜先生之弟子徐文德、林超民以及尤中等地方史专家的课，系统学习了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地方史讲义》和《云南郡县两千年》、尤中教授的《云南民族史》、汪宁生教授的《云南考古》，以及“图书目录学”“历史地理学”等课程，我犹如一个被人引领行走于林荫道上的孩子，沿途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到处流水潺潺，莺啼燕舞，应接不暇，处处感到陌生中的新奇，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感到幸运的是，我才踏入这一全新的领域，就有这么多的名师引路，给予指点，使我对今后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充满了憧憬。这次培训为我的地方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半年的培训时间结束后，我带回了省志办为学员准备的书籍，这其中，有云南大学油印的方国瑜先生用尽一生心血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40多辑，复印的《新纂云南通志》260多卷以及三卷本的《续云南通志长编》《清实录》等。两年时间里，我不仅读完了所带回来的书稿，还在会泽县图书馆查阅了线装的280多卷的道光《云南通志》，师范编辑的光绪刻本《滇系》40册，《清朝文献通考》，乾隆年间付印的《湖广会馆传书》，光绪年间刘克升先生著述的《云南地志》，雍正、乾隆、光绪朝所纂修的《东川府志》以及《东川府续志》。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在大量的古籍线装书中摸爬滚打，为能在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古籍书中找到一条记载会泽的历史资料而兴奋不已，也曾因读完全书，未能发现一则有关会泽的史料而深感遗憾。我像在海滩上拾贝或在原始森林里采集蘑菇的孩子，铢积寸累，集腋成裘，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1986年，近六万字的《会泽县大事记》终于完稿，当时，会泽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赵发昌以及负责整个县志编辑业务工作的罗定宇先

生看完书稿后十分满意，进而打印成册，分送给全县各乡镇、各单位的修志小组，为各修志小组提供了便捷的查询历史资料的工具。书稿还选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会泽县志》中。该大事记在盛世纂修完成，在获取资料时，由于有大量重新发掘的史料和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远远超过了古人，所以显得主线清楚，材料翔实，弥补了会泽历史上三部志书和民国时编纂的《巧家县志稿》中“建置沿革”及“大事记”部分过于简略的缺陷，成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介绍会泽、东川、巧家等这一地域历史的资料。

事隔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为什么还将这部书稿增加新的内容，付梓印刷呢？

因为我所编纂的《会泽县大事记》虽选入了《会泽县志》（1984—1992）“大事记”一章，但根据志书的要求，收录内容过于简略，很多资料被拒之门外，实属可惜。会泽、东川、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较为翔实地介绍该地域历史的书籍，特别是当外地游客和媒体人员到会泽时，他们总希望一册在手，即可全方位了解会泽厚重的历史及文化，而我于1986年编纂的《会泽县大事记》基本具有这种功能。

三十年来，《会泽县大事记》陪伴我在地方志研究方面跋山涉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为我取得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期间，我也发现有很多资料尚未收入。特别是近些年在整个会泽历史文化研究中，笔者提出：绵亘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和“彝族祖源文化”，形成了会泽纵向上的两大文脉，由此派生出来的会馆文化、寺庙文化以及民居文化等十多种子文化，形成了会泽横向上的经线，这种纵横交错、经纬互织的文化特点，编织了云铺绮丽、霞叠瑰秀的会泽文化大观图。这一创见比较准确全面地概括了会泽文化的特点，用这个理念来审视三十多年前的《会泽县大事记》，就有必要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整理及补充。

近些年来，特别是会泽县城被批准为省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